

目 录

译者前言	(1)
前言	(1)
第一部	
第一章 亚诺夫卡	(1)
第二章 邻居和启蒙学校	(23)
第三章 家庭和学校	(36)
第四章 书籍和头几次冲突	(51)
第五章 农村与城市	(67)
第六章 转折	(79)
第七章 我的第一个革命组织	(89)
第八章 第一次入狱	(98)
第九章 第一次流放	(107)
第十章 第一次逃跑	(115)
第十一章 第一次流亡国外	(122)
第十二章 党的代表大会和分裂	(130)
第十三章 返回俄国	(142)
第十四章 1905年	(151)
第十五章 审判、流放、逃跑	(161)
第十六章 第二次流亡国外和德国社会主义	(174)
第十七章 蕴酿新的革命	(191)
第十八章 大战爆发	(203)
第十九章 巴黎与齐美尔瓦尔德	(212)
第二十章 驱逐出法国	(221)
第二十一章 穿越西班牙	(226)

第二十二章 在纽约 (238)

第二十三章 集中营 (246)

第二部

第二十四章 在彼得格勒 (252)

第二十五章 谈造谣中伤者 (262)

第二十六章 从7月到10月 (272)

第二十七章 决战之夜 (280)

第二十八章 1917年的托洛茨基主义 (287)

第二十九章 执政 (292)

第三十章 在莫斯科 (304)

第三十一章 布列斯特和约 (316)

第三十二章 和平 (330)

第三十三章 斯维亚日斯克一月 (344)

第三十四章 专列 (358)

第三十五章 保卫彼得格勒 (368)

第三十六章 军事反对派 (379)

第三十七章 军事战略问题上的分歧 (393)

第三十八章 转入新经济政策阶段及我与
列宁的关系 (402)

第三十九章 列宁在病中 (410)

第四十章 追随者的阴谋 (427)

第四十一章 列宁逝世与权力转移 (438)

第四十二章 党内斗争的最后阶段 (452)

第四十三章 流放 (469)

第四十四章 驱逐出国 (486)

第四十五章 没有签证的星球 (494)

大事年表 (508)

译者前言

在斯大林政权的敌人中，托洛茨基无疑是最凶恶的一个。所以，即便他已流亡国外，斯大林仍不能释然，屡派杀手，直到将他刺死才罢休。连赫鲁晓夫这位一心想为斯大林制造的冤假错案的牺牲者恢复名誉的人，在访华时也竟把“托洛茨基分子”这顶帽子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当然也毫不客气地回敬了一顶。在戈尔巴乔夫平反冤案的顺序表中，托洛茨基仍被排在最后一名。

托洛茨基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人们为什么对他这么耿耿于怀呢？看了这本书，读者会有一个清晰的理解。

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托洛茨基。他从年轻时就投身革命运动，在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中成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杰出理论家和领导者。他一手领导了1905年革命，在列宁不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武装起义的情况下，又是他领导了十月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后，国内反动势力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下掀起内战，想把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当时布尔什维克刚刚获得政权，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军队，而他们接管的国家又是被沙皇的腐朽的统治和连年战争消耗殆尽的国家。在这危若累卵、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托洛茨基临危受命、力挽狂澜，担起了革命军事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要职。在两年半的内战烽火中，他亲临前线、身先士卒，以其天才的组织能力在战火中建起了一支红军，并率领着这支队伍南征北战、粉碎了邓尼金、高尔察克、科尔尼洛夫、尤登尼奇、弗兰格尔等英法两国支持的叛乱部队，拯救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

内战结束后，苏维埃共和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它将在一片废墟上进行建设，但经济建设的命脉——铁路运输却濒于彻底瘫痪，又是托洛茨基兼起了铁路人民委员的职务，他用铁的纪律和有效的行政手段，使铁路运输恢复了生机，创造了“只有上帝才能创造的奇迹”。

这样一个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人物，怎么会败在斯大林手下呢？

托洛茨基本人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呢？他说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每次革命之后都会出现“热月政变”，无产阶级革命也不能例外。他这样说决不是为自己巧言辩解，只不过表现出他过于热衷理论、书生气十足罢了。

一般说来，规律越普遍，它所能解释的事物就越多，因而也就越笼统、越空泛。因此，任何一条普遍规律都要有无数特殊规律来补充。如果说人类社会的发展遵循着一条普遍规律的话，则任何一个具体社会的每一步具体发展都存在着无数的可能性，最起码是几个可能性。这些可能性都有成为现实的可能，至于哪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往往只是一些微少的偶然因素所致。无论哪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我们都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前此的一切因素都促使社会朝这个方向发展。但在另一种对立的可能性成为现实时，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根据来证实这种现实是历史的必然。托洛茨基未必会否定如果没有他和列宁的话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如果说十月革命是历史的必然的话，那么这种必然性是十分脆弱的，它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取决于托洛茨基和列宁存在这个偶然因素。“热月政变”的必然性也同样脆弱，在“热月政变”成为现实前同样也存在着其他可能性。只是历史是不可逆转的，某种可能性一旦成为现实，其他可能性便被排除。不过，我们总不能因此就否认其他可能性也存在过，也有成为现实的可能。遗憾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是既成事实，而不是选择。所以，用历史的必然性来解释斯大林获胜的原因，难免会流于空泛。只有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列宁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6人政治局中的力量对比，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

首先分析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由于布尔什维克长期处于非法组织的状态，因此不可能有广泛的党内民主。纵观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和捍卫政权的历史，使人有如履薄冰和走钢丝之感，一个机会把握不住、一个重大的失误都会导致整个历史重写。就是由于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列宁和托洛茨基高瞻远瞩、雄才大略，英明果断、才领导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并使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渡过了重重难关、转危为安。

十月革命只迈出了夺取政权的第一步，真正确定政权性质的工作——立法和建立新制度的工作更加艰巨。但由于当时俄国的落后，广大人民的文化素养低下，人民和广大党员与党的领导层的距离非常遥远，又加上十月革命建立的政权还十分脆弱，国内外敌人的猖狂进攻，使列宁无法实现他在《国家与革命》中描绘的社会主义蓝图，不得不使集权的倾向逐步加强。在喀琅施塔得反革命暴乱后，他取消了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使多党联合执政变为一党专政，党的权力集中于中央，最后集中在政治局。从1919年到1923年约4年期间内，列宁主持政治局会议约296次，处理和决定了2851个问题。在内战期间，由于党组织、工作方法和组织制度的全部军事化和高度集中制，使任命制得以普遍实行。十大又通过了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这个决议消除了在党内不同观点派别斗争的可能性。这种情况隐藏着巨大的危险，使本来是为了推动国家发展、促进社会民主主义而建立的专政有可能变成与其原来宗旨相悖的异化物，使工具本身变成目的，产生一批享有特权的官僚。

内战结束后，列宁发现了权力过分集中而产生的弊端和国家领导人陷入官僚主义泥潭的危险，他力图通过扩大党内民主、加强监察机构、取消委任制、进行民主选举避免这种危险。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努力没有收到预期效果，既没有改变国内战争期间已确立的政治体制框架，也没有改善权力高度集中的状况。正因如此，列宁在重病期间才如此重视格鲁吉亚事件，直至下决心撤消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因为列宁把它与政治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

有必要声明一下，上面所述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权力高度集中，只是为了对斯大林获胜的历史背景加以分析，而不是对苏维埃共和国体制的否定和贬低。相反，当时的体制是当时历史环境的必然产物，非此苏维埃政权就不能生存。另外应注意的是，那时苏维埃体制还处在草创阶段，带有应急和临时的性质。一旦条件允许，列宁立即考虑改革体制，从根本上消除官僚主义和其他隐患。还要说明的是，权力高度集中并不等于个人独裁、个人崇拜和终身制，后者是斯大林体制的特征。列宁领导时期，处于权力核心的是党的领导集团，是一个实行集体领导的政治

家集团。造成这种差别时主要是列宁和斯大林的个人品质、素养和人格的差异。

但斯大林恰恰利用了列宁试图加以纠正的由历史所造成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况为他独裁创造了基础。他通过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勾结控制了政治局，通过组织局安插亲信、排除异己，反对派别活动的决议使他可以把一切反对派都置于死地，集权制产生的享有特权的官僚成了他的权力基础。经过一系列紧张的幕后活动后，他在搞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已经稳操胜券了。

当然，在酿成这一结果的过程中，列宁本人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态度，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托洛茨基的自传中，只讲列宁对他的信任及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而列宁对斯大林的态度似乎只有嫌恶和不信任。可实际上，斯大林在权力角逐中获胜与列宁对他的态度是分不开的，他和托洛茨基一样，曾是列宁心目中的继承人人选。

为什么列宁把两个性格、品质，才能完全不同的人做为自己的接班人人选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谈谈列宁心目中理想的领袖所应有的素质。列宁认为，一个真正的政治领袖是能够把理想主义者忠于学说的原则和实用主义结合起来的人，而且还要有足够的个人感召力。列宁本人就具备这些素质，他的实用主义使他不至沦为乌托邦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使他在处理实际问题注重策略性、灵活性和随机应变；他的理想主义和理论原则又使他能够高瞻远瞩、忠于理想，永远不为实用手段所左右，而是让手段为目服务，从而保证他不至跌入实用主义的泥潭之中。一个真正的政治领袖实际上是一个能够把忠于理想原则和实用主义的不择手段结合起来的人。但在现实中，这种人并不多见。

托洛茨基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高瞻远瞩、历史洞察力、魄力和组织能力等都是毋庸置疑的，在布尔什维克的最高领导人之中，在这方面能与列宁相媲美的只有托洛茨基。1905年革命和1917年的十月革命都证明了这点。但托洛茨基的灵活性、策略性和随机应变的能力却不能令列宁满意。在《火星报》编辑部分裂时，托洛斯基纯粹出于对列宁的手

段不满而与列宁分道扬镳，在签署布列斯特和约时，他又是出于道义考虑而与列宁发生分歧，他为了使世界无产阶级认识问题的本质并揭穿布尔什维克与德国勾结的谎言，不惜冒遭受更大损失乃至失败的危险。列宁则不同，他对现实必要性考虑得更多一些，一旦看到现实必要性，他就能排除其他考虑，乃至使用一些不大光明磊落的手段，如在他反对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时那样，有时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如乘德国的铅封车返回俄国。此外，列宁对托洛茨基是否有足够的个人感召力也很怀疑。读了他的自传，我想读者也会觉得他是“至察无友”的人，他对布尔什维克其他领导人的评价也确实过于苛求。他的用人原则完全是出于对革命事业的考虑，决不为个人和集团利益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他对明仁斯基的态度就很可能说明问题。

斯大林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没有在革命的关键时刻表现出领袖的大智大勇，他的才能完全表现在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不受任何理论和原则的束缚，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后来列宁可能发现，斯大林不是不受理论和原则的束缚，而是根本就没有理论和原则，理论、原则在他手中也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托洛茨基的长处与列宁的一个长处相比，并无太大距离。而斯大林的长处与列宁的另一个长处相比，似乎还要胜一筹。因为列宁毕竟是个革命理论家、理想主义者，他要建立人类历史上最理想的社会，他在行动中不会完全摆脱理想、理论和原则的束缚。大概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更加器重斯大林。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中，本来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但在十月革命后，他的地位稳步上升，除了他强烈的摄取权力的欲望和不择手段、随机应变的能力外，列宁的器重恐怕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内战期间，战胜白军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头等大事，在每一个战役的胜负都关系到共和国的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斯大林支持和操纵的军事反对派严重地干扰了红军的战略部署，造成了许多无谓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仍没有制裁斯大林，而是极力设法调和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关系，以至托洛茨基愤怒地谴责他搞“靠不住的妥协”。

1922年间，尽管斯大林与列宁之间产生了一些磨擦，但列宁仍没

有改变对他的看法，每次见面都与他长谈。直到年底写遗嘱时，尽管他的选择倾向于托洛茨基，但他还是希望托洛茨基与斯大林能够竭诚合作，避免使党分裂。直到他确信斯大林掌权将葬送十月革命的理想、破坏社会主义原则时，才决心撤掉后者的总书记职务。可惜为时已晚，斯大林羽翼已丰，更主要的是列宁的健康情况已不允许他亲手把“炸弹”投向斯大林了。

任何一场政治或权力之争，胜负都是由实力对比决定的。早在列宁患病之前，虚荣、野心勃勃、权力欲极强的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为夺取最高领导权进行了一笔肮脏的政治交易，由季诺维也夫提议斯大林任总书记一职。列宁患病后，接班人的问题变得更加迫切，由于托洛茨基在苏维埃共和国享有崇高的威望，所以被他们视为夺取最高领导权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为此，他们更加紧密地勾结起来。加米涅夫本人没有野心，但他完全处于季诺维也夫的影响之下，布哈林也站在斯大林一边。这样，除列宁之外的5位最高领导人中，托洛茨基处于绝对少数。当列宁还能从事斗争时，托洛茨基依靠列宁的支持，还有获胜的可能，甚至在列宁逝世后，他利用列宁交给他的“炸弹”，也仍有获胜的可能。但他却出于对“空位期”和党的分裂的顾虑，没有积极地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从而导致自己彻底的失败。当列宁已经决定撤消斯大林总书记职务，开除其党羽奥尔忠尼启则和捷尔任斯基的党籍时，他还有所保留，仍希望斯大林能改过自新，希望最高领导层能竭诚合作。在他的对手们私下策划要在政治上把他搞垮时，他却令人不解地无所作为，竟然还去郊区打猎，以致染上使他丧失战斗力的疾病。托洛茨基这样做，也许是意识到力量对比悬殊，如他在自传中所说的，即便获得胜利，其结果能维持多久是颇成问题的。也许他是出于自信，象他这样能够准确地把握历史转折契机、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人，只要有机会，必将会东山再起。因此，他想进行一场长期斗争，从做青年工作入手。但他没有充分认识他的对手斯大林，对对手们针对他进行的斗争的性质也不够明确。这场斗争对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来说，是一场夺取最高权力的斗争，夺取权力是唯一目标，因而在手段上无所不用其极。权力斗争是你死我活

的斗争，斗争的对手是获得或保持权力的障碍，不把障碍除掉就得不到权力，所以就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干掉对手。这场斗争与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以往的党内斗争完全不同，在那些斗争中，尽管不排除策略，但要取胜主要是依靠理论和决策的正确性，通过辩论和投票解决问题。这种党内斗争是同志之间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分歧的斗争，斗争的双方是同志，所以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保留观点，也给人改过的机会。可惜这个优良的党内斗争传统被罪恶的夺权斗争破坏殆尽。

季诺维也夫在这场斗争中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他的下场也十分可悲。开始时，他为了实现其权力野心，无原则地与斯大林勾结在一起，并且比斯大林更加迫不及待地想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党的领导层。在苏共十二大上，又是他主张扣压列宁的“遗嘱”。季诺维也夫打着他的如意算盘，他想利用擅长搞阴谋诡计的斯大林除掉托洛茨基，只要托洛茨基一垮台，第一把交椅非他莫属。列宁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最高领导核心毕竟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党的最高领导权决不会落到一个只会在幕后搞小动作的人的手中。但他错了，他想利用斯大林时却被斯大林所利用，他也没有想到他与斯大林联合进行无原则的权力斗争时，对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基础和党的原则破坏有多大。

托洛茨基垮台之后，斯大林马上把矛头对准了季诺维也夫。季诺维也夫发现上当，便转而与托洛茨基结盟，但为时已晚，斯大林已牢牢地控制了全党，他动用一切力量，使反对派处于被动挨打、根本无法进行政治斗争的地步。季诺维也夫为了免遭天顶之灾，又向斯大林投降。此后，他更是被斯大林玩弄于股掌之上。基洛夫被暗杀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以列宁格勒反对派总部组织暗杀基洛夫的罪名逮捕并判刑，后来又再次进行审判，被判处死刑。他们早就了解斯大林的为人和残忍本性，他们在与托洛茨基结盟前就写下遗书，一旦意外死亡，定是被斯大林暗杀。尽管如此，他们在内务部严刑逼迫他们承认捏造的罪行时，仍相信斯大林虚假的承诺而在法庭上自作自践。季诺维也夫临刑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们，看在上帝的面上，请给斯大林同志打个电话吧！”当斯大林的卫队长在酒宴上表演这一场面时，

斯大林竟笑得前仰后合。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历史惨剧啊。

倒是布哈林对斯大林的本质认识得更为深刻：“他（斯大林）是一个没有原则的阴谋家，使一切服从于维护他自己的权力。他怎样改变他的理论，全看他此时要搞掉的是什么人。他设置种种圈套，指控人们搞背叛。”在这方面，他比托洛茨基高明，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斗争是由于后两人的国际视野比斯大林的开阔所致，斯大林整布哈林是反右的历史趋势的体现。但就是这个对斯大林的本质认识颇深的布哈林，在20、30年代的苏共党内斗争中，也不象他在其遗嘱中所说的那样清白。在20年代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斗争中，布哈林是斯大林的得力助手，因为当时的党内斗争仍沿袭列宁时期党内斗争的传统——论战，当然已不是真正的平等辩论，而是采用包括吹口哨、跺脚、骂大街等不正常手段在内的种种方法剥夺对手的发言权。似乎不应怀疑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真诚，他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论战的确是出于他与后者的理论观点有分歧。但他不会不知道斯大林的目的和种种阴谋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仍积极协助斯大林，不能不是他一生中最严重的污点。

看了这些事实，我们不得不赞成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在评述斯大林夺权斗争时的一句话：可悲的不是在党的领导层中有斯大林这样的人物，而在于他的对手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不过，还应补充一点，即托洛茨基相对来说责任最小，一是因为他在列宁丧失活动能力后，确实处在寡不敌众、孤掌难鸣的地步，二是在这些人当中，只有他一人对斯大林背弃十月革命理想和列宁主义原则的做法进行了殊死的斗争，直到40年被斯大林派遣的特务杀害。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目光短浅，他们为了自己夺权或其他原因与斯大林联合起来战胜了托洛茨基，但全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本人很快也成了这场胜利的牺牲品。

※

※

※

早在托洛茨基被暗杀之前，他的所有亲人几乎都已惨遭不幸。在他被驱逐出国后不久，他的前妻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及他的小儿子谢尔盖、女儿尼娜，女婿涅维尔松和他们的两个幼小的孩子（托洛茨基的外孙），还有另一个女儿齐娜伊达的丈夫沃尔科先后都被杀害。齐娜伊达逃到柏林也难逃脱死神的追逐，1933年被苏联特务杀害。在流放及流亡国外时一直陪伴托洛茨基并协助他工作的长子列夫也在巴黎被苏联特务暗害。这就是这位十月革命领导人、苏维埃制度缔造者的命运。他惨死异乡，还背负着列宁主义、苏维埃制度最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走狗的罪名含冤九泉，不禁使人感慨历史的不公。

不过，历史终究是历史。1988年以来，苏联陆续为斯大林在20—50年代所制造的种种冤假错案平反，为受害者恢复名誉和党籍，害人者也受到了应有的谴责。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的杰出领导人也先后得到平反。87年11月，苏共中央书记雅可夫列夫宣布，苏共中央已决定重新编写党史教材，88年6月，影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因歪曲历史，为斯大林的阴谋服务而被禁演。

由此看来，历史是公正的，它不会永远任人篡改，迟早会做出它的庄严宣判，嘲弄历史者必将受到历史的嘲弄！

※

※

※

由于托洛茨基的自传是写给知情者看的，因此，一些重大事件只做了些提示，粗略地勾勒几笔就够了。其中某些重大事件，尤其是列宁在患病期间与斯大林进行的斗争，在斯大林掌权后被一笔勾销，有关文献被严密封锁，官方党史对此更是讳莫如深。有鉴于此，在这里对此稍加介绍并非多余。

首先介绍一下有关外贸垄断权的斗争。1921年，大多数党的领导人认为外贸人民委员会不能有效地处理国际经济交往事务，因而主张放权或取消外贸国家垄断。斯大林、布哈林都赞成这种观点。1921年

底，参加里加谈判的苏维埃代表米柳亭宣称将取消外贸垄断。但列宁却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是对国家利益的严重侵犯，这等于允许外国商人同国内私商直接接触，这是十分危险的，它将导致破坏苏维埃本来就十分虚弱的工业，有助于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和俄国商人、农民结盟，共同反对苏维埃政权。

22年3月，列宁的观点似乎已经获胜，并颁发了几条加强外贸垄断的法令。但这并不是最终的胜利，政府和中央委员会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并制定新计划。这些做法严重地损害了苏维埃外贸代表在同外商谈判中的地位。列宁对此深感不安，他写信给斯大林要求重申外贸垄断原则，并撤消一切反垄断的计划。斯大林在列宁的信上批道：“我不反对在现阶段‘正式禁止’放松对外贸易垄断方面的步骤。但我仍认为，放松将是不可避免的。”

5月22日，政治局接受了列宁的观点。但在列宁第一次发病和休养期间，反垄断派获得了胜利。在10月6日举行的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列宁因病未能出席），通过了索柯里尼柯夫降低国家贸易垄断的提案。列宁决定为推翻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而战斗，他分别给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政府高级官员写信、会晤，谋求支持。当他得知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与他观点一致时，他于12月12日建议与托洛茨基结盟，共同反对官僚主义。13日他给政治局发出急函，断然要求否决上述中央决议。政治局被迫让步。斯大林在列宁的信上附了一张条：“列宁同志没有改变我的看法，即认为……关于对外贸易问题的决议是正确的。”但他最后还是做了让步，同意重新审议这个问题。

12月15日，列宁在给托洛茨基的便条中请他在中央全会上表明，说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并在给斯大林和其他中央委员的信中宣称“我已就维护我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的观点同托洛茨基达成协议，……托洛茨基将和我一样坚持我的观点。”

12月18日举行的中央全会宣布它原来的决定无效，这一斗争以列宁的胜利告终。列宁兴高彩烈地向托洛茨基祝贺：“好象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

……”。由此可以看出，这场对外贸易垄断权的斗争仅仅是列托联盟所筹划的反官僚主义斗争中的一个战役，而与官僚主义的决战却是由格鲁吉亚事件触发的。

格鲁吉亚事件最后决定了病中的列宁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关系，使列宁下决心彻底铲除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党内官僚主义。可以说它是列宁在其政治生涯的最后阶段为捍卫他的革命理想和原则所进行的最后的斗争。

格鲁吉亚事件的起因比较复杂。在1920到1921年间，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等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是由俄罗斯联邦与其他共和国所订立的双边协定来调节的，每一个共和国都有一套与俄罗斯联邦政府平行的结构，各个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指导地方政府，但同时又通过党的内部纪律服从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

1921年，列宁要求把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3个高加索地区的共和国组成一个泛高加索联盟，斯大林的朋友、高加索局的首脑奥尔忠尼启则十分热衷于这项事业，但遭到了格鲁吉亚共产党的强烈抵制。格鲁吉亚人关心民族独立，强调格鲁吉亚在苏维埃体制框架内独立的原则。格鲁吉亚人与高加索局的矛盾由于奥尔忠尼启则轻视地方领袖的意见而进一步激化。在奥尔忠尼启则准备新的进攻时，格鲁吉亚人通过了决议，坚持他们的民族独立不可侵犯。奥尔忠尼启则无视格鲁吉亚人的意见，依靠较为驯服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领袖宣布建立一个联邦政府。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与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

1922年整整一年，这场斗争始终没有停止，它是苏维埃共和国体制建立以来，在各共和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所发生的最严重的事件。1922年8月10日，政治局会同组织局成立一个委员会，旨在调整俄罗斯联邦及其他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委员会成员中俄罗斯联邦的代表有斯大林、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则等，其他共和国各出一名代表，格鲁吉亚的代表是穆迪瓦尼。委员会主席是斯大林，他起草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与独立的共和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委员会的决议草

案，即所谓的“自治化计划”的决议，该计划使各独立共和国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使俄罗斯联邦政府凌驾于其他共和国之上。列宁由于患病不能办公，没有参与此事。

斯大林的决议草案遭到3个共和国的抵制，格鲁吉亚人更是断然反对。奥尔忠尼启则对此做出反应，高加索局不仅通过批准了斯大林的决议案，它还运用党组织的上下级关系命令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必须服从斯大林的命令。

正在康复的列宁对这个问题十分关心，9月，他听取了斯大林有关委员会工作进展的情况汇报，斯大林把有关的全部卷宗送给他。列宁经常会见所有当事人，但他当时对事件的态度还是倾向于奥尔忠尼启则和斯大林。列宁曾指责穆迪瓦尼是“有搞‘独立活动’嫌疑”的分子，不过，他也认为斯大林有些操之过急。因此，列宁拒绝了斯大林的自治计划，并建议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列宁说：“我们将同他们一起平等地加入新的联盟。”为了保证平等，他从斯大林的计划中删掉了有关各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段文字，并建议改成“同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起正式联合组成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列宁建议成立一个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联邦执行委员会和一个新的联邦人民委员会，俄罗斯联邦政府不是联盟的政府，它本身也将纳入这个组织的管辖范围之内。

但斯大林却不能忍受这点，他一心想造成既成事实。他认为列宁对此事的干预毫无意义，并对此十分愤怒。在一次会议上，他和加米涅夫就列宁的备忘录交换了简短的便条。

加米涅夫的便条上写的是：“伊里奇已下定决心为维护独立而战斗。”

斯大林回答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坚决地对付列宁。”

9月27日，斯大林把列宁的备忘录送交政治局，并附上自己的一封信，公然指责列宁的“民族自由主义”，说他鼓励分裂主义分子，对列宁的论点逐条批驳。在意识到他在中央委员会将处于少数时，他才全面让步，把他的自治计划改为联盟计划。

10月6日，列宁给加米涅夫写了一张便条：“加米涅夫同志，我宣布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斗。我那颗讨厌的蛀牙一治好，我就要用满口的好牙吃掉它。在联盟的中央委员会中绝对坚持由

俄罗斯人

乌克兰人

格鲁吉亚人等等轮流担任主席。”

中央委员会接受了列宁的观点，一致采纳了这个计划，并指定一个委员会担任起草一个草案提交下次会议。穆迪瓦尼不反对这个草案，但他要求格鲁吉亚也象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一样做为独立成员，而不是南高加索联盟的一部分。格鲁吉亚人再次向莫斯科抗议、反对泛高加索联盟，斯大林粗暴的答复引起了更加强烈的抗议。于是奥尔忠尼启则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措施，他依靠莫斯科书记处，命令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的支持者离开他们的本土，把他们召到莫斯科听候处理。但这些措施也不能使格鲁吉亚人屈服，他们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毫不退让。他们还给布哈林和加米涅夫写信，但这使他们受到新的指责。更叫他们失望的是列宁听取了布哈林的汇报后，在10月21日给他们的复电中对他们加以谴责。格鲁吉亚人不能期望从莫斯科得到公正的处理，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们于10月22日集体辞职。奥尔忠尼启则马上指派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莫斯科立即接受了前中央委员们的辞职和新的任命。但老的中央委员们并没有停止斗争，他们实行怠工，针对着莫斯科的意外事件和控诉接连不断。这种情况激怒了奥尔忠尼启则，他竟然在办公室中动手打了一位穆迪瓦尼的支持者。马哈拉泽等人写了一封抗议书，要求对此事进行调查。

直到这时，列宁才对此事有所警觉。当政治局要他投票表决书记处派往格鲁吉亚负责调查党内争端问题的委员会名单时，列宁弃权。他对这个委员会能否秉公办事表示怀疑，因此他想寻找其他情报来源，以便对事件做出判断。于是他指派正在格鲁吉亚的李可夫对此进行调查。这时，列宁才意识到他与斯大林在格鲁吉亚问题上的分歧是原则性的分歧。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采取的是典型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斯大林

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简单粗暴的方法与他想建立的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的目的是-一致的。这在斯大林自治计划的第六条中暴露得最充分：“本决定如经中央赞同，不予公布，而作为通令转发给各民族的党中央，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时，再作为这些共和国的愿望予以公布。“玩弄强权把戏”，硬把强制命令乔装打扮成民意，弄虚作假，搞阴谋诡计是斯大林处理事情的典型手法。危险的是这种命令主义的搞法已成为一种制度，其原则并非来自十月革命。

列宁也要巩固国家，但他认为少数民族的问题只能慢慢地解决而不能强制，国际主义不能作为集权主义的牺牲品。列宁的联盟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原则，这就是要保持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权利和它们各自的民族感情。他所创立的体制是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侵犯其他民族，同时要保证各共和国的地方共产党人能够在党内从法律和体制上维护自己的观点。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在一个被他征服的国家中竟然象总督一样，这是打击整个革命政体的迹象，而且还将继续为害。格鲁吉亚事件在列宁眼中的意义骤然增大，用什么方式解决格鲁吉亚问题变为一场关系到十月革命原则和传统，苏维埃共和国向何处去的斗争。因此，列宁开始考虑撤换斯大林，彻底改变党的建制，扩大中央委员会的规模，恢复它的权威。为了完成这一工作，列宁积极活动。

最关心接班人问题的斯大林对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接近深感不安，做为中央委员会指派的患病的列宁的监护人，他千方百计地限制列宁的活动，医生为病人开处方和做建议须和监护人协商。列宁的秘书发现，不是监护人服从医生，而是医生服从监护人。斯大林还正式指示，在列宁病榻前所发生的一切都要向他本人汇报。在斯大林的严密“监护”下，列宁的活动受到严重的干扰。列宁为了争得行动权，不得不以拒绝与医生合作相要挟。

12月22日，斯大林得知克鲁普斯卡娅据列宁的口授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即祝贺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获胜的短笺，斯大林就在电话里对她进行“无端的辱骂和威胁”。

12月23日到31日之间，列宁口授了一份文件，其中最后一条是1

月4日增补的，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文件。12月30至31日，列宁口授的是关于民族问题和自治化问题的文件，他在这里严厉地谴责、批评斯大林的民族政策。

为了从政治上彻底搞垮斯大林，列宁全力以赴，积极准备。1923年头几个月，他组织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格鲁吉亚事件。3月3日，委员会得出了它的调查结论。3月5日，列宁口授了那封授权托洛茨基为格鲁吉亚事件辩护的短信以及给斯大林的最后通牒。3月6日，列宁口授了支持格鲁吉亚人的便笺。列宁打击斯大林的“炸弹”已经制好，可惜他已不能亲自用它来炸毁目标。3月7日，列宁再度中风，3月10日再度偏瘫，从此完全丧失说话能力，列宁的政治生命到此结束。虽然他把“炸弹”（他的笔记和全部案卷）交给了托洛茨基，但托洛茨基没有在十二大上把它投出，却与斯大林达成了“靠不住的妥协”，使列宁在其政治生涯最后时期所做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付诸东流。

※ ※

※

本书第一卷由石翁、施用勤译，第二卷由张以童、张以道译。